

日本五山山谷诗抄物中的政论性阐释管窥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张 丽

[摘要] 日本五山山谷诗抄物《帐中香》与《山谷抄》中可见大量涉及北宋政局的注释内容。其阐发模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知人论世型，注重从诗句中发掘诗人的政治抱负与洞察；二是主观介入式，集中体现为对王安石及新党的全面否定。这种否定态度，与五山禅林所流传汉籍中的偏颇取向以及崇尚苏黄之风密切相关。此类政论性阐释根植于中国诗学传统，并因山谷诗言近旨远的特质而得以充分展开，同时与禅僧参与幕府政治的切身经验亦不无关联，属于山谷诗注释中的常见现象，展现出五山僧超越性的理解能力与鲜明的价值判断，丰富了山谷诗的解读视角。二抄在内容层面趋于一致，然诠释风格迥异：《帐中香》注重引证典籍，论从有据；《山谷抄》则偏重直解，主观评判色彩更浓。

[关键词] 山谷诗抄物 政论性阐释 帐中香 山谷抄

引言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其诗深受日本中世五山禅林的推崇。室町时代(1336-1573)中后期，几乎所有禅僧名家都曾讲习、注解其诗，留下了丰富的注释文献，即“山谷诗抄物”。山谷诗抄物现存十余个系统(柳田征司，2004:26-35)，根据抄者与成书先后，大致可分为：万里集九(1428-?)抄《帐中香》、一韩智翊(生卒年不详)抄《山谷抄》、月舟寿桂相关本及林宗二抄《黄氏口义》四个系统(京都大学黄氏口义研究会，2024:46-55)。其中，前二抄成书最早，表记文体分别为汉文与和文(假名ソ体)，不仅相互间无直接依存关系，且为后出诸本广泛援引(京都大学黄氏口义研究会，2024:47-48、55-59)，是日本山谷诗接受史上的典范性注本。

二抄所注皆为山谷诗“内集”，均以南宋任渊(1090-1165)《山谷诗集注》^[1]为原典。不同于任注偏重典故提示、“止能注其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识诗意”(方回，2005:1085)的注释风格，作为域外注释书的二抄，整体上更侧重于诗意的通解。这种阐释取向上的差异，尤其表现在二抄中大量的政论性解诗内容上。五山注释者往往通过联系诗人所处时代背景与生平经历的联系，试图揭示诗句背后所承载的政治寓意。笔者以诗歌隐喻性与政治指向的关联度为基准，对二抄中的政论性阐释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多达一百六十余首诗的解读涉及政治意涵，占总释诗数的二成以上。这一比例显示，政论性阐释在整体注释中占有相当分量，呈现出一种普遍存在、具有自觉性的阐释取向。

[收稿日期]2025-09-01

[作者信息]张丽，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域外汉学，电子邮箱：zhangliruc@fox-mail.com

目前,国内外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山谷诗抄物的文本,并涌现出一定的研究成果(绿川英树,2017:132-149;绿川英树,2021:271-307;绿川英树,2022:219-228;大塚光信,1992:91-109;大島絵莉香,2022:41-59;卞东波,2019:176-187;朱秋而,2013:45-62;谢文君,2023:112-121;张淘,2020:63-76;商海锋,2018:73-109)。然而,对于释文中政论性阐释的探讨尚为薄弱,迄今只有小野泰央对《山谷抄》中王安石形象的考察可资参考,但就其广度与系统性而言,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此类政论性阐释,作为山谷诗域外接受中的重要方面,不仅扩展了山谷诗的解释维度,也反映出五山禅僧对北宋政局与黄庭坚生平的理解程度与评判取向,值得进一步加以探析。本文拟以《帐中香》与《山谷抄》^[2]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五山山谷诗抄物中的政论性阐释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重点考察五山僧如何在释诗过程中引入政治意涵,并揭示此类阐释生成的内在动因;同时分析二抄在具体解诗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兼与任渊注本相比较,进而明确二抄各自的阐释风格。

1 知人论世型阐释

五山二抄中的政论性阐释,就分布情况而言,主要集中于黄庭坚政治上行期的诗作中,而在其贬谪期作品中则鲜见相关解读(但该时期的诗作数量本就有限)。这一方面反映出山谷在仕途受挫后更趋谨慎的语言策略,另一方面也表明五山僧在注释中并非任意附会,而是尊重诗作本身的语势与语境,在可阐释范围内展开理解。这一阐释意识突出体现为其在解读过程中,往往结合山谷不同的官宦阶段,析出相应的政治意涵,呈现出“知人论世”的诠释取向。

1.1 馆阁期诗作阐释中的颂圣与忠谏

元祐前期(1086-1090)是司马光出任首辅的旧党执政时期,也是黄庭坚任职馆阁、仕途最为顺遂的阶段。在此时期的诗作注释中,五山禅僧常常提及两类政治主题——对统治者的礼赞与积极的政见陈述,勾勒出诗人所寄寓的政治抱负。

首先,颂圣书写。元祐元年(1086年)诗作《次韵曾子开舍人游籍田载荷花归》首句“维王调玉烛”释义中,任渊提示“玉烛”二字典出《尔雅》“四时和谓之玉烛,注云:道光照”(任渊,2013:81),即玉烛为四季和气,温润明照之意。《山谷抄》基于此“玉烛”之意联系时政,直言“维王”为新即位的哲宗,哲宗因施仁政而四时和,“维王指哲宗。玉烛为阳光照耀之意。天子如施仁政,则四时调。如此即天子之德照耀。玉烛为哲宗施仁政四时调”(一韩智翊,1663:278)。《帐中香》则着重对“维王”二字进行了考据。“维王”典出“毛诗十六大明篇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其诗曰不易维王”,意为“为王”,“今哲宗皇帝嗣神宗,在位用维王二字”(万里集九,1624卷三下:10b),即哲宗业已继位,诗句中的“维王”指哲宗,与《山谷抄》同义。实际上,在元祐元年政局中,政务实权主要掌握在宣仁高太后手中,年幼哲宗的政治影响力尚未真正建立。二抄对“维王调玉烛”一句所作的推衍——盛赞哲宗仁政,不免略显牵强。然从文本本身来看,该句描绘的是帝王亲耕、顺应节气的礼仪场景,属于典型的礼制颂扬。因此,五山僧据此引申出诗人对政局安定的颂赞之意,虽有发挥,亦非无本之木。此外,还可见沿袭任渊注释并反复套用的现象。元丰八年(1085年)诗作《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中有句:“日月进亨衢,经纬寒耿耿”,任渊注曰:“日月以言二圣”(任渊,2013:56)。二抄不仅在解释此诗时承袭该说,亦在后续诗作中出现“日月”意象时——如元祐二年(1087年)诗作《卧淘轩》“日月丽宸极,大明朝万邦”,以及元祐三年(1088年)《款塞来享》“毡裘瞻日月,鹄面带金犀”——作同解,以“日”喻

哲宗,“月”比宣仁高太后,将诗句理解为诗人对哲宗当朝、宣仁垂帘所形成稳定朝局的颂赞。

其次,政治见解与陈情表志。元祐三年所作《和子瞻戏书伯时书好头赤》,是黄庭坚次韵苏轼题李伯时画作《御马好头赤》之诗。对于颌联“秦驹虽入天仗图,犹恐真龙在深谷”,《山谷抄》指出此句实为诗人的政治观点,即朝廷虽然致力于广纳贤才,但仍有人才埋没于朝堂之外(一韩智翊,1663:701)。(《帐中香》通过引用《周礼·庾人》所载“马八尺以上为龙”,构建了诗中“马”与“龙”意象之间的诠释纽带,表明“真龙比贤人,贤人虽集朝而犹有遗贤之在野也”(万里集九,1624卷九下:40b),意同《山谷抄》。此外,还对“遗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推测:通过援引南宋王正德著《徐师录》所载《答王云书》中黄庭坚对陈师道的赞誉之辞,结合“是时陈师道等为徐州教授,未得显官侍朝”的状况,判断“遗贤”或指陈师道,并评语云“山谷有欲荐之心欤”(万里集九,1624卷九下:41a)。

作于元祐四年(1089年)的《题净因壁二首》是两首以寺院为题材的七绝,描绘了“团蒲”“疏箔”“催粥钟声”等寺中景物。对于“蕉心不展待时雨,葵叶为谁倾太阳”一联,二抄提出相同的两解:其一,“时雨”为“法霈”,“太阳”为禅僧,诗人渴望得到禅僧之佛法洗礼;其二,“太阳”为天子,“时雨”为贤相临朝,表达对天子的忠诚。

深意为山谷聆听禅僧一言半句,得到法霈的滋润,其心如芭蕉渴望时雨,对禅僧的倾慕如葵向阳一般(中略)。另,依司马温公所作“更无柳絮回风起,只有葵花向日倾”观之,山谷之心如芭蕉待时雨。希望终有一日会有贤良的宰相三公出现,慰藉天下苍生之渴望。本心虽不显露,但其怀有对天子的忠节之意,如葵向阳般,蕴藏于诗句中。

(一韩智翊,1663:810-811)

《帐中香》还将二解分别对应佛教中的“真谛”与“俗谛”,“真谛则言山谷渴望净因老师之法沛犹如蕉心待雨也,山谷倾心于净因老师犹如葵花向阳也;又其俗谛则言山谷坚守丹诚而期帝泽岂非蕉待雨,一日不忘君,岂非葵向阳为”(万里集九,1624卷十一下:2a-2b),得佛法洗礼为“真谛”,忠诚向君对应“俗谛”。据黄庭坚诗系年体例,此诗编次于《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之后,可知其创作时间当在苏轼离京之后。该年四月,苏轼因在政治斗争中进退维谷,获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的离去,对山谷而言,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诗伴,还意味着失去了在京师的政治庇护。可以看到,五山二抄对诗句的诠释,一方面体察到诗人“遁世逍遥”的显在庄禅取向,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诗人在失去京师重要政治依托之际的身份焦虑与忠心表态。

1.2 政局变动期诗作阐释中的政治洞察

在政治局势即将变动的敏感时期诗作中,五山二抄从中感受到了诗人深刻的政治洞察:元祐后期诗作被解读为对旧党势力变化的警觉反应,而崇宁初年作品则被阐释为对权力更替的批判性认识。

系年于元祐四年的《北窗》(编次于《题净因壁二首》之后),为诗人伏案之余,观照北窗夏景所作的一首七绝。对于末联“绿阴黄鸟北窗簟,付与来禽安石榴”,任渊虽然指出“有所寄”,但其解释却只停留在万物“各得其用”层面,“盖有所寄,言物化各用事于一时,姑听其自然耳”(任渊,2013:277)。对此,五山二抄则将其纳入具体的政治语境加以诠释。《山谷抄》认为此联的深意是朝堂之上小人已占上风,然万物有其时节,局势迟早会发生变化,应顺其自然,“朝廷中宰相三公很快更迭,而且变为一群曲者,即曾经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四时之物亦不定,贤者与恶者皆有时,宰相三公亦如是。究竟如何,且静观之”(一韩智翊,1663:813-814)。《帐中香》亦认为此句虽表面写景,实则寓意政局变动,“元祐党渐一变,而熙丰之余党次第茂长之兆”,并指出诗人对此持观望顺应之态,“高卧北窗之下任时变之,绿阴黄鸟来禽石榴而不可争其主张也”(万里集

九,1624卷十一下:9b)。元祐四年,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蜀党、洛党、朔党之间纷争不断。与此同时,高太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旧党的执政基础逐渐动摇,朝政局势益发复杂。五山禅僧从诗中所读出的“政局变动”的隐含意旨,正好回应了这一历史节点上权力更替、朝局混乱的现实语境。

作于崇宁元年(1102年)早春时节的《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之三首句“江山也似随春动,花柳真成触眼新”与后一首《再次前韵》“春工调物似盐梅,一一根中生意回”,按字面意思,表达了冬尽春来的喜悦。《山谷抄》却表示此二联深意为诗人对“崇宁天下一变”(一韩智翺,1663:1271,1272)的感慨。对于前者,《帐中香》同样表示此联虽写时节,实为对时局翻天覆地变化的喟叹,“起承虽言时节,谷意以为今当崇宁天下政道一变,故山川陵谷如变动也”(万里集九,1624卷十七下:35b)。该年是宋徽宗即位后,继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短暂调和新旧两党之后的第二年,此时朝政话语权迅速被新党掌握,旧党受到的政治打压也进一步加剧:正月,蔡京除右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四月底诏毁刊行三苏、秦、黄文集;九月立“元祐党籍碑”。二诗写作之际,蔡京业已上任,政治格局已有变动迹象,而诗人则自前一年四月到同年六月一直处于待命荆州的状态(郑永晓,1997:338-394)。五山二抄据诗中“冬尽春来”的描写,引申出“天下一变”的政治寓意,这一阐释与当时政局渐现动荡的形势以及诗人所处的焦虑边缘状态可谓不谋而合。

对于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所作《梦中和觞字韵》颌联上句“作云作雨手翻覆”,《山谷抄》认为此指熙宁至崇宁这几十年间政坛的交替沉浮:“此云天下之变。熙丰元祐各党分立。哲宗末期改元绍圣,用熙丰党数人。徽宗建中靖国兼用熙丰元祐二党。崇宁用熙丰党打压元祐党。天下如此数度变化”(一韩智翺,1663:1277)。《帐中香》之解同《山谷抄》,并通过援引瑞岩龙惺(1384-1460)之解,详尽回顾神宗至徽宗期间熙宁党与元祐党几度沉浮的历史,以揭示山谷对天下变化无常的嗟叹:

瑞岩云熙丰间先生及二苏不得其时,而宣仁垂帘粗,悔悟熙丰政事之非,进用老成人,乃是元祐之初也。无几,又熙丰之党以言新法可用之,议哲宗以为其熙宁间圣贤际会,故改元绍圣。然熙宁之党与元祐之党,其议皆驰,故中折以欲靖国家,因改元建中靖国,而及其终,又贵熙宁政事,遂改元崇宁。元祐党又四方竄谪而殆。如覆雨翻云之手,岂不悲哉。

(万里集九,1624卷十八上:4b-5a)

从五山二抄的解读来看,诗人此时的心境,已由前一年“天下一变”所引发的危机意识,转变为对政局反复无常的深切慨叹。这种情绪变化,与当时日益严峻的党争迫害、愈加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诗人自身历经贬逐、仕途沉浮的切身经验相契合。

如上,在元祐更化等政治上行期的诗作中,五山僧倾向于构建“玉烛调和”“蕉心待雨”等富于积极政治意涵的隐喻图式,凸显诗人拥抱时政、期冀有为的政治姿态;而对于政治形势即将逆转背景下的诗作,其注疏则转向“绿阴黄鸟”“翻云覆雨”之类意象的发掘,揭示诗人对时局变幻的敏锐感知与深层忧虑。这种历时性的阐释差异,与黄庭坚的政治处境以及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相符,体现出五山禅僧对北宋史事与山谷生平的深刻了解与精准把握。

另外,可以看到该部分释义内容基本上多为五山禅僧的独特阐发,体现出域外注释对诗意理解方向的自觉调整。任渊的注释风格稳健谨慎,少有政论阐发,即使《北窗》诗下提及“有所寄”,亦未明确指涉所寄之意,此与五山僧结合时局与诗人经历所展开的深层解读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二抄在解释内容上呈现出较高一致性,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山谷抄》更倾向于对诗句作直观浅出的理解,语言简洁、意旨鲜明;而《帐中香》则更强调考据支撑,致力于从典籍中寻找内在关联,以增强解释的理据与深度。

2 主观介入式解读

五山二抄中另一类重要的政论性解诗内容为对新党的全面否定,呈现出显著的立场色彩。内容依所涉对象可分为二:一是对新党党派直接否定,二是对领袖王安石的责难。

2.1 对新党之否定

五山二抄并未采用统一的“新党”概念,而是根据时期、主要人物的不同,以“熙丰党”“熙宁党”“绍圣党”“王吕党”等方式加以指称。禅僧们往往采用象征一隐喻式阐释,或从整体意象中提炼隐喻意旨,或对细节词句展开精微拆解,引申出诗人对新党势力的批判。

首先,将诗中关于天灾、恶劣气候的描写视为政治隐喻。元丰七年(1084年)诗作《次韵刘景文登邕王台见思五首》其三中的首两联:“系匏两相忆,极目十余城。积潦干斗极,山河皆夜明”,描绘了天水相合遥相望,积潦滔天的极目之景,二抄则对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山谷抄》以“积潦”一词为线索,联系诗人时地相近的元城黄河决堤灾情,指出此句寓有时政讥讽之意,认为洪灾之所以爆发,实因熙丰小人擅政、打压君子所致,“深意为熙丰党之小人,视天下为掌中一盃,冒犯君子”(一韩智翊,1663:140)。《帐中香》则简要记录道“或说积潦比王荆公等”(万里集九,1624卷一下:47a),将洪灾之害喻为王安石等人的政事之害。在对次年诗作《和答外舅孙莘老》首联“西风挽不来,残暑推不去”的阐释中,《山谷抄》将诗句所描绘的初秋燥热之景引向政治隐喻,指出其背后隐含的是诗人对王吕余党势焰未息、司马光与苏轼等人未得起用的忧思,“王吕之党如染风寒,虽衰而余党未尽。至于司马温公、苏东坡等人,虽应登用,然迟迟未见起复”(一韩智翊,1663:191-192)。

其次,逐一指认诗句中各意象所寓之言外意。对于元祐三年诗作《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有感》(诗题中的王子立为苏辙女婿)中的“燕雀蚩鸿渐,犬羊晚麟获”一联,任渊指出此句暗指苏辙(字子由),虽未直白解读诗意,却通过精确典据的列举,提供了诗意理解的方向(任渊,2013:244)。“燕雀”与“鸿”的关系源自《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名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用以区分胸怀壮志之士(鸿)与目光短浅之徒(燕雀),暗含高低贵贱之别。“鸿渐”一词出自《易经·渐卦》六四爻辞“鸿渐于木”,以鸿雁循序而进、飞栖树上为喻,多象征君子在仕途中的慎重进取与节制自持。“麟”出自《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是孔子悲叹“吾道穷矣”而绝笔《春秋》之处,多象征圣贤遭难,天命终止。基于任渊的典据提示,《山谷抄》直接将“燕雀”“犬羊”比小人“王吕党”,“鸿”“麟”比君子子由,并认为此联可二义解之:其一,贤才子由被小人嫉恨排挤;其二,子由“入朝遭嘲”且“放逐类麟”:

子由如鸿。若在熙丰时被召用,会遭到如燕雀般王吕党的嫉恨与排斥。下句同此意。麟为子由,犬羊为小人。一义。一旦子由入朝,燕雀即嘲之。子由在外流放,正如孔子之时麒麟现世却反遭伤害。如此,诗所表现的,正是那些如犬羊一般的小人肆无忌惮的祸乱行为。(一韩智翊,1663:723-724)

前者突出的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德性对比与党争冲突,后者强调的是圣贤受难与小人猖獗。在完成对诗中关键意象的象征指认之后,《山谷抄》还在最后点明诗中“小人祸乱政局”的潜在意涵,体现出对时代失序的批判性理解。

《帐中香》则通过引用《东都事略》的相关记载,对诗句中的“燕雀蚩”“犬羊睥”作出了联系史实的推定:

某谓仁宗嘉祐元年丙申,子由十八岁与兄东坡。注二十一岁。同举进士东游京师,同六年辛丑举直言,子由二十三,极言得失。考官胡宿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得。不黜,历商州大名府推官。详见东都事略子由本传并何抡三苏年谱等。上句燕雀蚩指是等欵。又神宗熙宁二年巳酉时,安石新得幸,神宗以子由为安石属官,不敢辞。以书抵安石。安石怒,将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下句犬羊睥亦指是等欵。

(万里集九,1624卷十上:12b-13a)

万里集九(某谓)的解读并未止步于语词的象征意义提示,而是将诗意整体嵌入新旧党争的历史脉络之中:“燕雀”讽刺心胸狭窄、见识浅陋之徒,正如胡宿因子由忠谏而欲黜之;“犬羊”则指行止乖戾、排斥异己之辈,恰与王安石怒其不附而构罪相符。

2.2 对王安石之责难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晚年被封为荆国公。历史上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在五山二抄中,却整体呈现出对王安石全盘否定的倾向。

这种彻底的否定态度,一方面表现为对王安石直接作出“奸佞”等带有鲜明道德立场的评价。元祐四年,黄庭坚作《范蜀公挽词二首》,悼念旧党重臣范镇(范蜀公)。范镇熙丰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致仕,元祐时期哲宗欲请其出山却遭拒绝。在“鳌去三山动,人危五鼎烹”一联的注释中,任渊指出此“言公既去,国本自此摇矣。方公请致仕时,介甫自草制,极口诋公,闻者皆为公惧”(任渊,2013:279)。从“极口诋公”这一春秋笔法,可窥见任渊对王安石追剿范镇一事亦存批判之意。二抄对此则更进一步:《山谷抄》径直表示“荆公为佞臣”(一韩智翊,1663:819);在释义“信道虽常尔,知人乃独亨”一联时,《帐中香》同样指出“王介甫等为佞臣”(万里集九,1624卷十一下:23a)。

此类直接否定在《山谷抄》中屡见不鲜,且多集中体现在诗题背景的交代部分。在《神宗皇帝挽词三首》的题解中,《山谷抄》直言王氏是“曲者”,致天下动荡不安:

神宗,名五。原本志在统一天下、实现太平,乃是一位如唐太宗般殚精竭虑于治世之人。然而,却遭遇了荆公这般曲者,政事遂偏离正轨,不复如其本意所望。王安石向宋神宗进言说:“不可模仿唐太宗的作法,应推行尧舜之道。”正因如此,天下败坏。

(一韩智翊,1663:166-167)

“曲者”中的“曲”,在日语中通常表示“弯曲”或“不正”,被用来指代“心怀不轨者”或“贼、敌人等可疑人物”。《山谷抄》在此处不仅将王安石直接道德定性为“曲者”,还将王安石用于争取变法正当性的道统语言——“行尧舜之道”作为误政之因加以批判。神宗本有一统天下、致太平之志,却因信任荆公而误国害政,这一诗题背景的补叙,不仅为后文诗意的理解设定了方向,也透露出注释者个人的价值立场。

此外,亦可见以王安石为参照,借以定位或评判他人的解读用例。《忆邢惇夫》作于元祐三年,为哀悼惇夫早夭之作。邢惇夫为刑恕之子。刑恕,字叔和,惯常趋附反覆,先后背离司马光、章惇,后又成为蔡京心腹,《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山谷抄》在开篇介绍刑恕时,表示“恕与荆公同恶”(一韩智翊,1663:757),以荆公为参照系,描述刑恕之恶。在对宰相王圭的挽词《王文恭公挽词二首》的人物介绍中,《山谷抄》指出“王圭虽为宰相,但无荆公之威,也不曾与荆公同流结党”(一韩智翊,1663:176),将异于荆公,且与之划清界限

之举衬托王圭品格的高洁。

另一方面,在黄庭坚维护王安石的诗作中亦附会出批判之意。《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作于王氏病逝之后的元祐元年秋,是黄庭坚对于其于西太一宫壁上所题诗作的次韵组诗,第一首原文如下:

风急啼鸟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对于首联所描写的风雨将至前自然界之紧张纷乱异象,二抄则赋予其强烈的政治讽喻色彩,作出了如下解释:

此诗上半段,描写了诗人刚到此地时的时令景象:风起鸟鸣,雨来蚁乱,奔跑如战斗般,俄而四散。所谓“酣”,指事物的接近终末的状态。^①熙丰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引发党争,此诗以此为喻。描绘了是非混乱。所谓“常平仓法”,自古便有。在丰年时,米价便宜,农民辛苦耕作反而赔本;此时富人便会低价大量囤米,等到荒年再高价售出,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困。于是朝廷设法治理,丰年时由政府高价购米储存,荒年则平价出售,这就是“常平法”。王安石废除此法,将卖米所得的钱在春耕时借给百姓,并附带二文利息,设提举官催讨,甚至在青苗未熟之际便强行征收,导致百姓流亡,这就是“青苗法”。即使有人说此法不好,荆公仍听而不改,坚持以自己的主张为本。他还任用韩绛、吕惠卿,大力推行新法。^②此两句以此为背景。^③另一义。乌鸦尚且能预知风向,拣低枝筑巢;蚂蚁能预知下雨,事先就堵住蚁穴。连乌鸦和蚂蚁都能预知风雨的变化,王安石却不了解天下不得治的始末,实是连乌鸦和蚂蚁都不如的人。

(一韩智翊,1663:293-295)

旧抄云风急则啼鸟未了,雨欲来则战蚁掩土。是皆圣知之物也。荆公不如鸟蚁未知先非可笑哉。樵云熙丰之间一非一是徒党相争,譬如啼鸟战蚁也。未了方醉四字,是非纷然而未了之义也。

(万里集九,1624卷三下:23b)

《山谷抄》记录了三说,其中解一、解三与《帐中香》的两解基本相同:第一解(^①)着眼于诗句中蕴含的动荡、混乱与激烈斗争的氛围,将其投射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语境中,认为诗句是对熙丰年间党争的隐喻;第三解(^③)则强调乌鸦、蚂蚁的“天候感知能力”,将其设为最低的“理政能力”标准,讽刺王安石连最基本的政治预判与应对能力都不具备,实属“禽虫不如”。可以看到,相较于《山谷抄》,《帐中香》的阐述更为简要,且标注了两解的来源——旧抄与惟肖得岩(号樵,1360-1437)。《山谷抄》中的第二解占据了释义的较大篇幅,着重铺陈“常平仓法”的优越制度设计与实际成效,进而反衬“青苗法”的危害,同时描述了王安石在推行变法过程中的刚愎自用,认为该联寓意于此。即诗句中所描绘的纷扰混乱之景,是新法流弊所引发社会动荡的象征性写照。

在第二联的注释中,任渊指出,对王安石的评价随政治立场而异,并无定评,“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任渊,2013:86)。万里集九指出任渊之解将是非争议的焦点指向王安石一人,并提出了两点看法:

某谓如天社注则是非共系荆公也。和荆公之韵及此论实有深意也。荆公薨后而第三句甚感慨。真

是真非安在有两点也。真是以下二句盖迷上二句之意也。在熙丰,是荆公,非温公,以下君子也。在元祐,是温公等,作王吕党,互是非。元不真也。譬清水寺在东山,故京谓之东山。又关东谓之西也。方角亦不定也。在是非如此也。元不真故云安在也。

(万里集九,1624卷三下:24a)

其一,在熙丰、元祐之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评价因时易势,熙丰间以荆公为是、温公为非,元祐间则反之,体现了时局变迁所带来的是非互易现象,同任渊之解;其二,以“清水寺在东在西”为喻,指出地理方位尚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异名,是非之判断亦复如是,皆由立场(本)决定,呈现出万里对政治评价的相对性认识。接着,万里还引用《言行录外集》中所载邵雍于治平年间曾就杜鹃北飞之现象,预言南气入主、天下将乱的佚事,指出“南气”为王安石,回应了诗中的“南北”,仍旧透露出对王安石变法祸乱天下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山谷抄》在题解时表示该诗貌似赞誉、实则贬斥王安石,“王安石搅扰天下,虽为曲者,却能写出如此有趣的诗。看起来称赞他是异才,实为谴责,颇具深意”(一韩智翊,1663:293),对于此句却作出了相矛盾的阐释。通过方向相对的譬喻,指出诗句并无批评王安石之意,“以某个方向为北,朝那个方向走,再回看时原先以为的北反变成南。元祐党好、熙丰党坏,尚无定论。没有责难荆公之意”(一韩智翊,1663:295),意同任注。

如上,五山二抄对王安石及新党一派持有强烈的否定立场。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诗歌文本本身的语义边界,反映出注释者基于特定历史视角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折射出其对北宋政治史的选择性理解与意识形态立场。任渊在注释过程中,虽偶有明确提示,但更多是通过标示典故出处,隐约指引诗意理解的方向。五山二抄则在接收到任注的解释信号后进一步展开,阐发过程中往往带有注释者鲜明的主观判断。例如,直接将王安石定性为“奸佞”之徒等激烈批评,即属其一。这种主观性较强的否定态度,在《山谷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常在题解部分就预设立场,且在具体释义中,善于通过生动的历史事例强化理解,提升可读性;相比之下,《帐中香》虽亦表达对王安石、新党的否定态度,却更侧重于援引典籍、借史实以附会诗意,力图构建解释的合理性。同时,它在征引前人见解时较为严谨,往往标明出处,表现出不同于《山谷抄》“拿来即用”的注释风格。

3 主观非议王安石与新党之原因

实际上,同为江西出身的王黄二人不仅有交情而且关系匪浅:黄庭坚曾盛赞王安石“直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2021:628-629);二人还在诗词交流上有着良性互动,如《书赠花光仁老》中所载荆公曾为山谷书扇(黄庭坚,2021:1450),《雪浪斋日记》所记二人探讨李后主词之趣事^①,以及荆公曾为山谷之画作跋并赋诗《跋黄鲁直画》等。博览群书的五山禅僧理应知晓二人的交情,却仍在注解山谷诗时读出山谷对王安石的强烈否定,此种态度的缘由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

首先,与当时五山所流传的中国典籍密切相关。五山抄物中对宋代历史的认知,主要依据《东都事略》《三朝名臣言行录》《宋元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通鉴)等史书。例如,在人物生平的介绍中,《帐中香》频繁征引《东都事略》《三朝名臣言行录》;解释《题山谷石牛洞》“祖师有记传衣”时,《帐中香》与《山谷抄》均引述《宋元通鉴》中王安石令“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的相关记载;释义《次韵刘景文登邕王台见思五首》的“积潦”一词时,二抄又引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元城洪涝的史实。然而,这些史书本身即带有较强的立场倾向。《东都事略》虽为北宋纪传体史书,史料翔实,但其作者王称生活于南宋前期,未能摆脱

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观念偏见,对王安石及熙宁变法多有攻击(仓修良,2006:164)。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内容详尽,然其对王安石之贬远甚于褒。清人蔡上翔曾评道“王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蔡上翔,1994:618)。《宋元通鉴》中有关王安石的记载,主要取自南宋初重修的《神宗实录》——据记载,宋高宗为将北宋灭亡归因于变法,授意史官“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李心传,1992:100),蔡上翔亦道荆公的污名多源于此书,“公之受穆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蔡上翔,1994:586)。《续资治通鉴长编》虽重在客观汇集史料,然其注文中亦多流露出对变法的否定(裴汝诚,许沛藻,1985:69)。除史书之外,五山流传的其他汉籍同样多呈现对王安石不利的论述倾向。南宋笔记小说翹楚《容斋随笔》论及王安石,谓其为人奸邪,改革荒谬,整体持否定立场,对后世贬抑王安石之舆论形成影响深远(范建文,2014:60)。该书在当时已有流布,《帐中香》中可见其直接引文,如注《次韵子瞻武昌西山》一诗的“漫郎”(即元结)时,即援引《容斋·三笔》〈唐观察使〉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万里集九,1624卷五上:22a)之语。宋学在中世禅林的兴盛,使《朱子语类》备受推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篇所载“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言荆公学术之缪,见识之差,误神庙委任,则可”(黎靖德,1994:3097-3099)等言论,皆体现出鲜明的批判立场。禅林中广为传读的江西诗派诗话,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亦多见“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矫饰伪行”(何文焕,1981:306)之类对王安石为人与施政的指摘。这些典籍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五山禅僧对王安石的整体认知。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中国诗文家多置身政治现实,对王安石的评价兼具政务考量与史论辨析的史观,室町中后期的禅僧对中国史事的阅读,已少有深入考订,更多是借史拓展其教养,以资四六文写作之文辞。在这一史观与诸典籍负面叙述的共同作用下,五山禅僧对王安石的理解难免愈趋于扁平化。

其次,对苏黄的景仰而形成的“爱屋及乌”式情感迁移影响。据早川光三郎与吉井和夫考证,东坡最早于平安后期,即去世后半世纪左右为日本人所知,镰仓时代其诗文已得到禅僧们的推崇,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宗龙统在《东坡先生画像赞》描绘了当时禅林对东坡的高度敬仰:

既蜕世至于今,阅年殆乎四百,是非判然,天下归正,慕者倍蓰其存之日,及此扶桑万里之外,靡然思其人。思其人而不已,讲其书,讲其书而不已,肖其像以传,实天定胜人者。不知自今之后,与孔孟俱行于世,复可累几百年,是孰使其然哉。(正宗龍統,1971:108-109)

“思其人”“讲其书”“肖其像”“与孔孟俱行于世”,对东坡的推尊盛况可见一斑。黄庭坚尊东坡为师,自定交后二人赠答往还、诗文酬唱不断,山谷诗集中收录了许多与东坡相关的诗。综合来看,五山山谷诗抄言及东坡,集中于两方面内容。

其一,强调东坡的政治才能。黄庭坚于元丰元年(1078年)首次向东坡投寄的《古风二首》饱含了对东坡才能的仰慕,全诗托物引类,“前篇以梅属坡”(任渊,2013:7)。在“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的释义中,《帐中香》提到“上句言时辈之群小忌坡之高才,下句言仁宗能识坡有相才,故云为子孙得两宰相,盖指坡与子由也”(万里集九,1624卷一上:23b),并引《东都事略》第十三慈圣光献皇后借宰相三公之说救苏轼于乌台诗案的轶事,凸显东坡被皇帝认可的政治才能。在对“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的解读中,《帐中香》引用惟肖得岩之解“若求宰相之才,实在此人也”(万里集九,1624卷一上:25b),突出东坡的宰执之才;《山谷抄》则详述了东坡“宰相三公”的故事以及南宋高宗提及东坡有宰相之才的逸闻:

东坡在朝廷中可为宰相三公辅佐天子。以东坡比宰相。山谷则不能。慈圣光献皇后曾违反条例对神宗说,旧时仁宗为我子孙觅得两宰相,正是东坡兄弟。如今为了莫须有之诗,使其入狱,实属可怜。皇后在病中仍挂念此事,神宗落泪,坡遂出狱。另,南渡宋高宗曾强言道,如有东坡此类人成为宰相三公,天下可再兴。坡比宰相,自此而始。

(一韩智翊,1663:35)

其次,对东坡被贬的愤懑与耿耿。东坡应为“宰相三公”的想象与屡遭贬谪的现实之间的落差,引起了五山禅僧的不满。《次韵子瞻武昌西山》“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二联的释义中,《山谷抄》强调东坡被贬后胸中愁绪如山,有大才却获罪遭流放为小官(一韩智翊,1663:387-388);《帐中香》诘问道“东坡不能得爵位而却受谪官之责,时乎命乎(万里集九,1624卷五上:25a)”,饱含对东坡被贬不得用的愤慨。在“鹦鹉洲前弄明月”一句的释义中,任渊只提及鹦鹉洲的地理位置(任渊,2013:116),五山二抄则根据“鹦鹉洲”联想到祢衡见妒于此地被杀的故事:《山谷抄》称祢衡不合时世,遇难葬身鹦鹉洲,如东坡不见容于世而流放黄州,意在以坡比祢衡(一韩智翊,1663:388);《帐中香》虽未明示此意,却花费大量篇幅引用《后汉书·祢衡传》《文选·鹦鹉赋》等文献中关于祢衡与鹦鹉洲的记载,意图亦不言自明。

在五山禅僧看来,王安石、新党屡次迫使东坡、山谷降职或流放,是东坡、山谷的政敌。对东坡、山谷的深厚敬仰,往往伴随着对王安石与新党的负面看法。其实,对新党、王安石的明显贬斥还表现在禅僧们的自作汉诗(曹逸梅,2023:113),以及其他诗注本中。例如,在南宋诗僧总集《中兴禅林风月集》中《临平道中》一诗的解读中,五山注释者同样明确否定了王安石,“王荆公这样的恶人在身边,频繁号令,使天下人陷入困境却无罪过”(大塚光信,2000:3)。可见,对新党、王安石的否定业已成为禅林的共识。另外,这种共识——不管是对东坡、山谷的推尊之情还是对王安石、新党的厌恶之感,在五山禅林友社兴盛、诗会频繁的背景下,往往于高频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同化与强化。

4 山谷诗的政论性阐释动因

事实上,政论性阐释并不局限于山谷诗抄物,而是五山注释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杜诗续翠抄》《三体诗抄》《四河入海》《中兴禅林风月集抄》等诗抄物中亦不乏此类解读。因此,山谷诗抄物中的政论性阐释,不应被视为孤立的个别现象,而应理解为在特定诗学氛围与注释习惯中自然生成的结果。那么,这种政论性阐释方式的依据为何?五山山谷诗抄物为何存在如此丰富的政论性解诗内容?

首先,是其中国诗学传统的影响。中国诗学向来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无论是“诗可以怨”的政教观,还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美刺理念,皆体现了诗与政的紧密关联。《毛诗正义》提出“主文而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更确立了政治书写在诗歌中的合法性,也使得结合时政背景的理解成为一种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的阐诗方式(周裕锴,2019:113)。尤其到了宋代,诗学批评在“意在言外”“言近旨远”的审美追求下,逐渐形成了“物象类型”与“以史证诗”的分析范式(张伯伟,2006:53-70),更加强调诗人与时势、史事之间的密切关联。随着宋代诗论在禅林中的广泛传播,其诗学理念亦逐渐影响了五山僧对中国诗歌的读解,促使他们倾向于关注诗作与历史、政治之间的联系。同时,正如张伯伟所指出,宋人注诗常以万物皆可寓意为前提,倾向于从主观意念出发,将史实与诗意相互比附(张伯伟,2006:53-70)。例如,惠洪诗话著作《天厨禁脔》中就可可见不少“物物皆有所托喻”的笺注,而宋人“千家注杜”则倾向于以己之意捉诗人之志。五

山山谷诗二抄中的政论性解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并深化了宋代诗论中的主观阐释路径,呈现出将诗意与史实密切关联的特征。

其次,山谷诗本身提供了阐释空间。黄庭坚反对诗歌表达之直露,主张诗歌应“兴寄深远,不犯世故之锋”(黄庭坚,2021:412),展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幽微深远,具有讽兴曲喻、谐婉等效果。所谓“兴寄”指“兴感”与“寄托”,都是在物象中寄托情志,前者类似风骚的“比”,后者更近于《诗经》的“兴”。无论是《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以梅比坡、《赣上食莲有感》以莲子喻同胞兄弟,还是《演雅》一诗铺陈四十余种动物形态,山谷诗中的“兴寄”往往构建出意象间的隐约关联,于语言内部形成显著的空白与张力。这种“空白”正可对应沃尔夫冈·伊瑟尔所提出的“文本召唤结构”:文学作品通过“空白”与“未定点”激发读者参与意义建构,促使读者以自身经验与想象介入其中,从而生成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北宋朝堂的政治语境在客观上强化了山谷诗的阐释弹性。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使身为苏门弟子的山谷产生了全身避祸的心理,不仅焚烧了大部分早年的敏感诗作,亦在之后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更为隐晦、委婉的书写风格。元祐更化后,山谷的处境进一步受到旧党失势的影响,尤其是因参与编修《神宗实录》措辞“不恭”而被重贬的经历,更使他深切体会到语言之于政治的风险与重量。晚年致外甥洪驹父信中曾言:“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2021:425),直接体现了他对后辈在文学创作中应持谨慎态度的劝诫,强调应避免措辞过露、情感过激的表达。这种克制含蓄的诗学理念与开放的语义结构,为后世的山谷诗注释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构成了政论性阐释的重要基础。

最后,禅僧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为其理解政治局势提供了切身的经验依据。在镰仓幕府主导下确立的五山制度,原本即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日益壮大的禅宗力量。进入五山体系的禅寺位列禅林之首,享有幕府的庇护与诸多优待。五山僧侣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世之僧,而多以幕府文化顾问的身份承担政务、文书与外交事务,是深度参与政治的文化群体,梦窗疏石、义堂周信、瑞溪周凤等皆为此类僧人的典型代表。五山二抄的注释者万里集九与桃源瑞仙(新村出,1972:481)^[4]皆亲历应仁之乱(1467-1477),避乱地方,依附于武家势力而得以安居。这种乱世流离与依附经验,使二人对权力更迭与政治纷争皆有切身体认。尤其是万里,《帐中香》的成书过程本身即与当时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应太田道灌之邀赴关东讲学,未久,道灌为上杉定正所杀,万里被上杉氏强行挽留,滞留江户。期间,应道灌叔父叔悦禅禅师之请,始讲山谷诗,历时三年而成《帐中香》之雏形。桃源则于乱后避居近江永源寺,专事讲学,山谷诗讲义即于此时展开。无论是亲历权力更迭的万里,还是乱后广开讲席的桃源,二人皆在动荡的时代中形成了对政治纷争与权力关系的敏锐感知,而这种经验亦悄然转化为其诗文阐释中的政论性解读倾向。此外,置身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之外的“他者”视角与“后人”视角,也为禅僧们获得另一种敏感性,使他们大胆地将诗中若干意象理解为对现实局势的回应,从而形成具有政治指涉的阐释路径。在这种诗、史交融的阐释中,诗歌成为禅僧表达政治立场与历史态度的重要载体,呈现出五山注释活动中诗学与史识的复杂交织。

5 结 语

如上,五山山谷诗抄物的代表作《帐中香》与《山谷抄》所呈现的政论性阐释,无论在解读方式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明显区别于任渊注本。这种阐释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其一为“知人论世”式阐释,从诗句中读出诗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洞察;其二则是主观介入型解读,集中表现为对新党、王安石的整体否定。前者多注重史实与人物背景的勾连,后者则偏重主观性价值评断,二者共同构成五山诗抄中政论性阐释的重要面貌。

其中,二抄对王安石及新党的彻底否定态度,一则与五山禅林所流传中国典籍中的舆论倾向密切相关;二则出于“爱屋及乌”的移情心理,对东坡、山谷的推崇加深了对王安石、新党的反感。本质上,这种政论性阐释倾向根植于中国诗歌的政教功能,并受到宋代诗论风格的影响,是五山诗抄中常见的阐释方式。山谷诗二抄延续了这种阐释传统,更因山谷诗“言近旨远”的特质,使此类阐释得以充分展开。此外,禅僧参与政治的切身经验不仅赋予其对权力动态的敏锐感知,也为其阐释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理解参考。

尽管《帐中香》与《山谷抄》在注释内容上大致相似,但在具体的阐释风格上却展现出显著差异。汉文抄《帐中香》注重引经据典,往往从他处典籍中寻求诗意的勾连,并在引用时注明出处,展现出一种近于学术注疏的严谨态度;而和文抄《山谷抄》则更倾向于以简明的语言切入诗意,常在题解中预设价值判断,表现出鲜明的主观立场。这种差异或可归因于两部诗抄的受众定位及成书语境的不同,亦为后续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此外,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累积性的注释传统,五山诗抄中的诸多阐释往往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演化发展。明确区分哪些内容为旧说承续,哪些为注者自出机杼,是厘清其注释体系与思想取向的关键,也构成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

- [1] 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初刊,实际上是与《后山诗注》合刊的《黄陈诗集注》。据任渊政和辛卯年(1111)自序所言“取二家之诗,略注其一二”,以及许尹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序中所述“以二家诗为之注解”,均可明确看出此次刊行系黄、陈二家诗注的合刊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所载“注黄山谷诗二十卷、注后山诗六卷”,亦可视为该版本存在的佐证。
- [2] 本文所用《帐中香》底本为日本国国会图书馆藏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4)古活字版本,请求号WA7-92;本文所用《山谷抄》底本为抄物小系所收《山谷诗集钞》正保四年(1647年)整版本之宽文三年(1663年)后印本。文中《山谷抄》的引文皆为笔者所译。现存建仁寺两足院本、正保整版本和黄乌钵抄。据大塚光信考证,正保整版本为写本两足院本的翻刻本,二者基本同文;黄乌钵抄前十一卷与前二者基本相同,从十二卷起内容完全不同,属其他系统。
- [3] 《雪浪斋日记》云:“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山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
- [4] 新村出根据桃源瑞仙年谱中文明九年(1477年)闰正月条目载桃源曾应梅甫淑之请讲解山谷诗,推测作为弟子的一韩智翎在场聆听此讲义,即《山谷抄》是一韩基于桃源的讲义内容进行抄写与整理的成果。

参考文献

-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2卷[M].2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 卞东波.宋代文本的异域阐释——黄庭坚《演雅》日本古注考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1).
- 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吉井和夫.苏东坡在日本受容的摇篮期[J].王连旺,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23(25).
- 早川光三郎.苏东坡与日本文学[J].王连旺,邱惠珍,译.三苏学刊,2024(1).
- 朱秋而.试论五山文学对黄庭坚的接受与变化——以《山谷抄》为主[J].台日语文研究,2013(25).
- 任渊.山谷诗集注:上[M].黄宝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M].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张洵.日本五山禅僧山谷假名抄小考——以一韩智翎《山谷诗集钞》为例[M]//近世中国与日本汉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 范建文.《容斋随笔》对王安石形象的历史书写及其影响[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4(1).
- 周裕楷.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周裕楷.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文学文献出版社,1997.

-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M]//郭绍虞, 主编. 第五十九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钱志熙.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黄庭坚. 跋王荆公禅简[M]//刘琳, 李勇先, 王蓉贵, 校点. 黄庭坚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曹逸梅. 日本五山禅林诗画世界中的东坡形象[M]//宋诗典范与日本五山汉诗.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 商海锋. 「香、禅、诗」的初会——从北宋黄庭坚到日本室町时代「山谷抄」[J]. 汉学研究, 2018(36).
- 绿川英树. 万里集九《帐中香》的诗学文献价值[J]. 清华学报, 2021, 51(2).
- 谢文君. 禅香诗与鼻观法: 论五山文学的黄庭坚诗接受[J]. 文学遗产, 2023(3).
- 蔡上翔. 王荆公年谱考略——王安石年谱三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裴汝诚, 许沛藻.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黎靖德. 朱子语类[M]//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大島絵莉香. 黄山谷詩抄物「演雅」の解釈について—万里集九『帳中香』を中心に[J]. 日本漢文学研究, 2022(17).
- 大塚光信. 山谷抄[M]//続抄物資料集成: 第十卷解説. 大阪: 清文堂, 1992.
- 大塚光信. 中興禪林風月集抄[M]//新抄物資料集成: 第一卷. 大阪: 清文堂, 2000.
- 小野泰央. 一韓智翹「山谷抄」の王安石観について[J]. 中央大学国文, 2011(54).
- 中川徳之助. 万里集九[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7.
- 今泉淑夫. 桃源瑞仙年譜[M]. 東京: 春秋社, 1993.
- 正宗龍統. 禿尾長柄帚[M]//玉村竹二, 編. 五山文学新集: 第四卷.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1.
- 芳賀幸四郎. 中世禪林の学問および文学に関する研究[M]. 京都: 思文閣, 1981.
- 京都大学黄氏口義研究会. 抄物を読む——『黄氏口義』提要と注釈[M]. 京都: 臨川書店, 2024.
- 柳田征司. 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J]. 訓点語と訓点資料, 2004(113).
- 緑川英樹. 万里集九が読んだ黄庭堅集—『帳中香』を手がかりに[J]. アジア遊学, 2022(277).
- 緑川英樹. 山谷詩在日本五山禅林的流傳與閱讀[J]. 新宋学: 第六輯, 2017.
- 新村出. 桃源瑞仙の事蹟[M]//新村出全集: 第九卷.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Japanese Gozan Commentary of Huang Tingjian's Poetry

ZHANG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Japanese Gozan Commentaries of Huang Tingjian's poetry, Chōchū-kō and Sankokushō,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nnotations concer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These may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modes of exposition: the first is a biographical-historical mode, which emphasizes the poet's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insights as reflected in his verses; the second is a subjective-interventionist mode, characterized above all by a categorical repudiation of Wang Anshi and the New Policies faction. Such a st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transmitted in the Gozan monasteries, as well as to the cultural prestige accorded to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This form of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is indebted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ics, while also facilitated by the allusive character of Huang's poetry, which permits open-ended interpretation. It further reflects the monks' own experience of involvement in shogunal politic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uang's reception, it thus exemplifies a typical phenomenon, marked by interpretive extension and evaluative positioning. The two commentaries are similar in content but diverge in style: Chōchū-kō relies heavily on citations and textual corroboration, whereas Sankokushō adopts a more straightforward mode of commentary, with a stronger tendency toward subjective judgment.

Keywords: Commentary of Huang Tingjian's poetry;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s; Chōchū-kō; Sankokushō

(责任编辑: 李广悦)